

# 從台東莖葉探索社區營造之外的 農村動力的新可能性

張育銓\*

## 摘要

台東市、卑南鄉、太麻里鄉為台東縣種植莖葉最多的區域，種植面積與生產量都佔全台80%以上，是台東農業中最重要農作物。長期以來官方對檳榔相關產業採取三不政策（不鼓勵、不輔導、不禁止），莖葉也在這樣的政策下，以民間技術交流與產銷機制的建立，建構屬於莖葉的產業鏈。然而，隨著衛福部強力在不同媒體與不同媒介的宣導下，檳榔的食用人口不斷下降，直接衝擊檳榔相關產業發展及其就業人口扮演的社會文化功能。

本文採用基礎資料調查法收集莖葉在地化特性，探討台東莖葉作為一種特色產業的不同面向，期待可以為台東莖葉開展另類的

---

\* 現任：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副教授

視野與多元發展。同時，透過這樣的歷程思索農村地方活化是否有從社區營造團隊往職業團體位移的可能。

**關鍵詞：**台東茗葉、社區營造、職業團體、農村動力

## 壹、前言

農村的動力在哪裡？為何農村持續衰敗，人口持續外流、農業人口持續老化、農業產值持續下滑、農村文化持續衰微、農地逐漸流失、農村生態持續惡化，如果有農村動力，為何忍心看著家園殘破；如果農村有動力，為何在眾多政策與龐大資金補助下，農村、農業、農民仍持續在我們面前消失？

難道農村動力被消耗了，在不完整的產銷制度、國際貿易中的農業定位，使農村的有志之士忙於投入研發違法邊緣的農產加工品，減少滯銷與價格崩盤，忙於在不同市場走向與種苗供應中，摸索越來越貴的肥料與農藥使用方法。難道農村動力被分化了，除了原有的宗教活動與公益活動之外，還要配合農會、公所、各承包政府案件的社區協會和基金會活動，使農村的有志之士疲於奔命。

先從幾項統計資料來看：1、農業衰退：2007年至2015年第三季農業占GDP比重最高只有2.05%，最低到達1.45%（中華經濟研究院，2015），農業經濟成長率長期呈現負成長。2、農業人口高齡化：台閩地區農牧戶指揮者平均年齡為63.4歲，且專業農牧戶指揮者平均年齡有一半以上皆超過65歲（行政院主計處，2011），台灣整體農業就業人口一半以上為55歲以上（行政院農委會，2015），並逐年老化中。3、兼業農增多，高達83%（行政院主計處，2011）。4、人口成長停滯與外流：在離農政策與農業衰退下，缺乏整體農村轉型方案而加速人口外流。在這樣的政策與社會背景下，務農者成為經濟上的弱勢，再加上農村的基本設施不足與

生活機能低落，導致農村文化傳承的困境不斷出現。

從台東各級產業就業人口比例與台灣地區比較，2013年農戶數為16,596戶，占現住戶數20.29%，高出台灣地區的5.28%甚多（台東縣政府，2015）。從就業者的行業結構中，2014年台東縣農林漁牧業人數佔全縣人口21.08%，遠遠高出台灣地區的4.95%（行政院主計處，2015）。再從就業人口行業別來看，2013年一級產業22%、二級產業20%、三級產業58%，對比於三級產業生產總額，2011年一級產業15%、二級產業32%、三級產業53%（行政院主計處，2015），相較於就業人口行業，一級產業的生產率有偏低的現象。

一級產業對台東的重要性，除了提供就業以及農地農用之外，對農業知識的傳承與接收迴游的台東人上相當重要。一級產業人口比率較高以及生產率相對較低的問題，不是單純讓一級產業轉型為其他產業類別，如何在既有的產業結構中尋求微調的契機是重要的思索起點。

對於台東的農村而言，在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影響下，許多中央部會的資源開始流入農村，包括農委會、內政部、交通部、教育部、客委會、營建署、文化部、衛福部等，但是許多以社區為單位的補助都是以單一部會的政策目標為導向，或者委由單一社造團隊執行，缺乏針對農村整體面臨的問題著手，也缺乏擴大參與的規劃，儘管假日人潮湧向農村社區帶來繁榮的景象，農村的困境依然存在，還是必須由地方特色中摸索出解決困境的方法（張育銓，2015）。本文從荖葉作為探詢解決困境方法的途徑，期待可以定位

出較被忽略的農村動力。希望從荖葉研究中，在農村的社區營造與農村再生的計畫運作型態之外，探尋以職業團體產生跨社區與村里界限的生活共同體，定位出農村動力的運作單位與更貼近生活的運作形式。

## 貳、農村動力的形式

儘管20多年來以社區為單位的補助政策早就把社造操作成一種職業，並且透過縣市社造中心以及各種協會連結成職業團體，然而，本文所指的職業團體是以產業經濟為連結的生活組織，而不是以補助計劃為連結的社造團體。本文將農村動力界定為，凝聚一群為農村生活型式的延續而努力的人所產生的力量。

首先初步盤點在不同政策取向下，農村動力的幾種形式：

### 一、農業政策下的農村動力

終戰後初期農業生產力低落，人口急速增加，導致糧食缺乏與物價飛漲，政策面透過農地改革（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耕者有其田）、農民組織改造（農會、漁會、農業合作社及農田水利會）、建立農貸制度（肥料換穀），技術面建立農業試驗研究與推廣體系、生產技術研發與品種改良、修築灌溉排水及生產化學肥料，有效增加農業生產、提高農民所得、以抑制糧價穩定工資與物價。農業生產技術改進，農業勞力大量釋出至工商業部門，導致農業勞動人口不斷減少，農村工資上漲，加上生產資材上漲，生產成

本提高，開放農產品進口後，農業競爭力減弱，糧食自給率下降。農業競爭力衰退，生產利潤薄弱，所得相對偏低，使非農業所得成為農家所得主要來源。此外，多年來為增加農業生產，超限利用山坡地，過度抽取地下水，大量施用農藥與化學肥料，造成水土資源污染，影響生態環境。

台灣的經濟奇蹟一部分是透過低價糧食供應以賺取外匯扶植工業，當經濟結構轉變，農業的產值式微，長期抑制米價導致農民所得相對偏低，國際自由貿易持續對農業擠壓，政府只能採用更多補助政策來維持農業部門。歷年重要的政策包括：1972年實施加速農村建設重要措施、1979年提高農民所得加強農村建設重要方案、1982年加強基層建設提高農民所得方案、1984年推動稻田轉作計畫、1985年改善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所得方案、1991年推動農業綜合調整方案、1995年制訂農業政策白皮書、1998年實施跨世紀農業建設方案、2001年推行邁進二十一世紀農業新方案。然而這些政策有一條軸線貫穿，農村改建、農地釋出、農村再生，認為農業是台灣經濟的昨日黃花與今日負擔，只好將農村、農地、農產品拆解進行結構性調整。

舉例來說，1973年廢除肥料換穀制度、取消田賦附加教育捐、停徵田賦、農地增值稅、牲畜屠宰稅等，解除農業多年來背負的經濟負擔。為維持穩定與合理的農產價格，實施保價收購、價差補貼、設置價格安定基金、契約收購價格等，但隨著1990年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在經濟國際化與貿易自由化，大幅削減價格支持與資材補貼。此外，

2000年修正農業發展條例，容許自然人及農企業購買農地，鼓勵企業投入農業經營企業化，也再造農漁會、農業合作社及農田水利會等組織，培育出富農與農業管理組織，卻同時輔導農民第二專長訓練，以促進農民轉業。這些政策呈現出搖擺不定的農業方向把農村帶向未知。

農村面臨人力老化、文化凋零、環境惡化，政府一方面鼓勵休耕，一方面鼓勵年輕人下鄉當農青，希望可以讓新觀念的人力資源改善農村。然而，在休耕政策下，一甲地每年可領12萬元，在台東承租土地現象普遍的情況下，導致年輕人遇到土地租金提高，成本增加與耕作觀念衝突等問題。於是這群農青投入社區營造、架設農業平台、文創包裝、文青化農業勞動，這樣的農村動力反而消逝得更快。儘管農政單位大力宣導生產、生活與生態的三生觀念，大力推廣農村、農民和農業的三農一體概念，但是在問題叢叢的農業政策下，農村動力如何可能。

在眾多農業政策中，農村動力被隱藏了，甚至是被取代了，透過農產品價格、農村人力資源、農地非農用、農地轉作與休耕、農村再生，這些歷程都不是以農村的發展為考量，而是以整體經濟發展、貿易自由化、救亡圖存的角度，農村動力被中央經濟政策、地方農民組織給取代，將農民簡化成等待下一步補助政策的群體，將農業規劃成耗弱的產業，將農村視為政府財政的負擔。如此狀況下，農村動力如何可能。

## 二、社區總體營造政策下的農村動力

台灣的社區營造地點以農村佔多數，一部分是引進日本造町運動以農村為自發性地點的經驗，一部分是從政策面試圖解決長久以來的農村問題。然而，歷經20多年的運作，儘管舒緩許多農村問題，卻也製造出許多新的問題，其中又以承接社區營造案件的社造團隊產生的問題最多，影響層面也最大，例如社造團隊的專職化、社造團隊的公司化、社造團隊的產業化、社造團隊的社造取向福利化、社造團隊名稱取代社區名稱、地方微型政治體（張育銓，2012），也就是說，社造團體把社造改造成一個農村居民無法介入的專業領域，因此，需要專職人員進行有效率的組織管理，透過豐碩的成果報告去投寄其他的計畫補助案，透過以案養案擴充組織規模。當社造變成一種專業的職業類別後，志工原本可以參與的會議與決策層面逐漸被剝奪，志工變成簽到單與照片中用來成果報告的人次，因此，只能看到活動中動員來的參加人次，看不到對社區事務參與的人數。再加上中央部會越過地方政府直接將資源進入社區的補助模式，使社造團隊與社區內隸屬地方政府的許多組織之間處於競合關係，當補助金額多到可以照顧到其他組織時，社造團隊變成地方上新的地方派系，變成具有領域、人民、預算、行政權的地方微型政治體。部分的社區營造變成一個專職團體、一個具成員審核的社團，或者說是一群使用社造語言的私人俱樂部。

這種社團化與俱樂部化經常是基於社造團隊核心人物如何在傳統人際網絡與補助經濟的利益分配原則之間推動社區營造，然而，為何推動20多年仍然無法凝聚在地人，而是吸引自家人或者外地人加入社造團隊，凝聚機制出了什麼問題，還是擔心被取代，或者理



念與利益分配模式出了問題。當社造團隊負責人的媒體曝光度比鄉鎮長還高的時候，如何處理與地方行政體系的緊張關係？當社造走向隨著政策方向走，累積出不少執行過的工作項目，而補助1—3年的計畫便可以解決農村長期以來特定的問題嗎？這些中央部會政策補助所對應的社區事務有延續執行嗎？

從社會分工的角度，社區總體營造是新的分工項目，和聯合國的社區工作以及鄰里互助或民間組織並不相同，主要在於經費來源以及經濟提供單位的政策目標，創造出以社造為行業的從業人口（總幹事、秘書、營造員、規劃師、營造中心、協會、審查委員等），形成新的分工。但是，從事的項目是新需求嗎？原有人際網絡與民間組織以及公部門系統無法執行嗎？新的分工是互補或者取代，甚至在直接來自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的行政與經費支援，產生對鄉鎮公所與村里行政及志工系統的公益參與剝奪。回到社會分工的角度來看，分工的用意是什麼？是否可能從原有的組織之間進行強化，在公部門之外，與日常生活具有真正生命共同體的人際網絡連結。

日本造町運動是在城鄉差距、農村人口外流的狀況下，透過自發性地發起地方產業振興運動，主要以農業為出發點以經濟性議題面對農村問題的核心。因為要發掘動農村動力，如果沒有工作機會，沒有實質的物質基礎，環境做得再美化，活動辦得再有創意，文宣寫得再受外界歡迎，媒體再如何寵愛，公部門給再多補助，也都是枉然。台灣的社造學自日本經驗，卻沒有將「振興地方經濟」的精神納入重要指標。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日本的造町運動是由地

方自發性產生的，對於經濟議題較為急切，而台灣的社造是由中央政府透過經費補助執行政策方向，對於抽象的共識與認同較為著重，而不是地方最在乎的生存問題與生活問題。

儘管社造政策提出「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目標，強調地方產業作為經濟與文化的連結，並加入社區觀光模式，提升在地人對產業文化內容的認同，從而對地方經濟與文化的願景產生更多可能性，如宜蘭白米社區的木屐、南投桃米社區的生態等，便是將文化、產業、觀光相互鑲嵌的案例。可惜，真正由社區發展協會或得標的社造組織所發動整合的案例並不多，大多是由鄉鎮公所或縣政府或其單位以及民間產業自行發動。社造對於振興地方產業的著眼點在於透過特色產業增加在地人的認同，比較偏向文化性而非經濟性的目標。

以農業作為地方特色產業的推動來看，如東港黑鮪魚節、大甲芋頭節、和平甜柿節、台北竹子湖海芋季、三芝茭白筍節、金山甘藷節、壽豐西瓜節、玉井芒果節、白河蓮花節、官田菱角節、古坑咖啡節、麻豆文旦節、公館紅棗節、蘇澳鎮南方澳鯖魚節、大湖草莓文化季、龍潭槿風茶文化節、甲仙芋筍節、關西仙草節、布袋烏魚祭、坪林包種茶節等。地方政府經常將地方產業包裝在觀光中成為施政重點，以台東為例，包括東河香丁、成功臍柑、成功旗魚、台東釋迦、達仁毛蟹、金峰洛神花、太麻里金針花、池上油菜花、關山米、鹿野茶、海端梅、蘭嶼飛魚等。但是，單單做為產季的促銷，只是遞補或者掩飾產銷機制的失能，如何從產業的特性與經濟效益中，找出可以規劃文化互動的學習與分享，才是振興地方產業

做為一種生活方式的目標。也就是說，在這經濟層面上，透過社造或者社造團隊存在不切實際的鄉野浪漫。

推動20多年的社造確實培養出不少明星級的社造團隊以及社造英雄，但是這些團隊與這些英雄有多少是屬於農村動力呢？

### 三、產業經濟下的農村動力

日本許多農村所屬的地方政府協助有心務農的人取得土地、補助租金、簽訂長期租約、設置農業學校、提供基礎建設、維護灌溉設施，讓農夫可以在自己的地上長出經濟能力與土地認同。以這樣的架構來看台灣的社造，問題出在中央跨過地方政府，導致地方政府對於社區的事務，經常因為資源分配問題而不願意支持，不然就是鼓勵承辦的社造團隊一魚兩吃，透過協助核銷，納入地方政府的績效。導致更多中央部會與地方政府帶著各自的資源與指導力量進入農村，不斷消耗農村動力，最後只留下可以應付這些行政流程與政治版圖競合的社造團隊。

如果振興地方產業是農村動力的來源，那麼台東農村有哪些經濟生活對人們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產生緊密的連結互助體系呢？農村的概念在某個意義上脫離村落與社區的概念，而是以勞動生產方式為主，存在於親屬與地緣基礎上發展出來的互助模式，以換工和技術交流的形式，形構出以農作物為時間與人力換算單位的運作型態。因此，以農作物為產業鏈的組織，符合農村動力的生活、經濟、文化、勞動模式。然而，這種以農作物產生的職業團體

與農村再生有何不同，農村再生只是農村社造的經費爆發戶版，並未從組織面以及人群連結的共同體著手，或者隸屬於村里戶籍可以啟動愛村意識，但是，以親屬互助與經濟生活的運作模式更是營造認同的關鍵。

重新審視社造政策中的「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發動端應該不是社區，而是產業（張育銓，2014）。社區營造已經走到不知如何收尾的地步，養出不少依賴社區營造維生的人，甚至在社區內成為特殊的階級團體（張育銓，2012）。透過農村產業集聚與串連的是永續經營的理念，而不是透過政策培植的年度計畫。農業地區的活化機會，不應該再由社造團隊主導，可以試著由區域的產業組織主導，回歸生活脈絡，不再是生活環境美化與地域性社區意識的虛擬共識營造。透過產業活動所帶動的參與成員，不再是被動的社區居民，而是產業內部從業者與所連結產業從事者之間的多元參與。這樣的多元參與有助於解決目前的社造困境，尤其是被困在特定的利益與政治糾結中，無法擴大參與，也無法擴大利益分享的範圍與對象，透過產業反而可以更真實地反應在既存的產業結構與分工與勞動人力資源中（張育銓，2016）。

再者，透過職業團體。並非在經濟部或人民團體架構下的職業團體，而是類似Emile Durkheim（2002〔1893〕）在《社會分工論》中提到的職業團體（corporation）。Durkheim提到的職業團體是一群從事同一類生產，並組織成為團體的一群人。除了必須具有正式的合法地位，可有效約制會員和對道德產生正面影響，並非只是因為經濟的理由，而是連結個人與社會的重要節點。Durkheim認

為應該以職業團體取代階級團體，讓大家有共同的道德，就可以減少社會上的衝突。Durkheim認為來自職業團體的機制與道德力量，可以維持社會的縝密連結，職業可結合個人成為社會的團體，能包容個體的自我，更能發展社會的連帶體與縝密連結（Durkheim, 2002：10）。Durkheim將社會形容為有機連帶體，職業填補國家與個體間遙遠的距離。每種職業提供社會所需的服務，個人、職業及社會具有環環相扣的特性，彼此間互相依賴。而且個人意識到群體性的責任感，此種使命式的責任感與社會道德規範有不可分的連帶性，而道德規範的影響力遠超過法律。如果荖葉產業可以透過農業涉入生活領域的話，正是從過去過度依賴社造團隊的趨勢，重新回歸到實際與日常生活運作相關的職業團體，達成在實務上與在理論上的雙重思考（張育銓，2016）。因此，必須思索農村的個人與社會之間的凝聚，找出動力端的轉移，從社區營造轉移到職業團體的可能性。

#### 四、農村團體的農村動力

在農村常見的團體有社團或法人基金會、慈善團體、表演藝術團體、協會、學會以及其他未登記立案之團體，這些組織的屬性包括具有非政府性、非政黨性、非營利性、組織性、民間性、公益性、自治性、志願性等。這些不同團體的成員儘管經常有所重疊，但是在人數、動員能力、資源類型、居民參與上，和社造團隊比起來更為接近民眾生活的脈絡。但是，這些不同團體相對缺乏來自中

中央政府直接補助的經費、提供的行政資源與輔導、賦予的合法性、塑造的價值性等支持。

以這些團體與日常生活脈絡的連結，可以粗分幾種類型：農業經濟類（合作社、組織研究班、各類產銷班、家政班、四健會、農事班、育苗中心等）、宗教祭祀類（廟宇管理委員會、頭家爐主、神明會、陣頭等）、體育健身類（土風舞社、原極舞社、外丹功推廣協會）、文化藝術類（北管社、南管社、書法學會、稻梗編織工作室）、公益服務類（老人會、慈心慈善會、世展會服務處）、非公益協力類（父母會、地方派系、宗親會）、休閒娛樂類（槌球隊、晨起會、歡唱會）等不同類型。這些團體的特色：1、規模小：主要由農村居民發起，滿足居民的生活需求，團體沒有立案的需求，對資金需求不多。2、數量多：一個農村中同時擁有相當多的團體是很正常的社會現象，這種原子化的組織模式可以深入日常生活不同層面。3、活動範圍小：活動範圍以農村為主，但不受限於行政單位的村里鄰或社區的空間界線，而是以不同生活層面的交往圈所構成。4、生活影響大：基於日常生活需求組成的團體，其影響力比起社造團體、地方性團體與全國性團體相對較深，也較長遠。

目前的社造與農村再生政策大多以單一團隊，尤其是以承辦的社造團體來認知社造工作，賦予單一團體對社區施作其理想的合法性，授予單一團體執行其資源分配的經費，提升單一團體對地方文化的認知成為當地價值的指標，這樣的政策完全忽略農村團體多樣性與影響力。思考農村做為尋找動力的單位時，不應該限制在以村

里為主的社區，也不該限制在具有合法程序申請的民間團體，而是應該擺在一個更大的社會架構以及具有日常生活影響力的評估基準上。對農村而言，重要的不是以政治操作的地理空間，也不是以單一團體獨佔所有資源的運作模式，而是在日常生活涉及的不同團體之間，共同存在於相互交疊的社會環境中。

進一步釐清不同團體的關聯，盤點不同團體對類似議題所能以及所願提供的資源，評估不同動力的組合模式，而不是單一團體取得公部門經費補助的組織自我合理化為地方代言人並主導地方事務，否則只會演變成地方上的資源對抗後的壟斷，形塑出一堆講抽象願景的社造專職人員，這樣的發展當然不是本文期待的農村動力。

透過對四種常見農村動力的初步說明後，發現與經濟生活直接產生連結的職業團體應該是一個可以持續發展的方向。進入討論荖葉產業鏈構成的職業團體之前，先回顧過去以社區為單位的營造，更可以清楚理解為何需要跨越地理界線的職業團體才比較符合農村的真正生活脈絡。

## 參、過去以社區為單位的營造

日本造町運動針對偏遠沒落的農村自發性進行營造，台灣是靠文化政策挽救與彌補農業政策的缺口，這個缺口就是農村動力。一開始文建會透過以中央部會的地位提供社區經費與行政支援，這種

經費補助式的社造動力經常面對質問，經費結束後該怎麼繼續推動的問題。20多年來，有許多社區黯然退出，有許多社區持續受到關注與培植，經費從沒有斷過。當文建會的社造政策獲得好評，中央各部會引發行政社造化風潮（曾旭正，2007），將行政規畫權與經費運用的主導權，大量釋放給社區內的社造團隊。這種中央直接補助社區的方式，除了可以避開地方政府的額外預算科目與挪用，使地方菁英在傳統地方派系之外，獲得社區發展的資源，培養出許多社造團隊優異的領導人把社造當成事業來經營，更重要的是中央可以和社區直接建立從屬關係，培植相對於傳統地方派系的社造新勢力。

行政社造化的項目與計畫相當多，僅列出較為廣泛補助給社區的類別：文建會的「鄉鎮展演設施方案」、「美化傳統文化建築空間」、「文化創意產業」；內政部的「創造城鄉新風貌」、「社會福利社區化」、「多元就業發展方案」、「培力就業計畫」；農委會的「富麗農漁村計畫」、「農村新風貌」、「休閒農業區」、「一鄉一特產」、「伴手禮」、「地方料理」；經濟部的「形象商圈」、「OTOP一鄉鎮一特色產業」、「觀光工廠推動」、「地方群聚產業輔導」；環保署的「生活環境總體改造」；經建會的「改造城鄉新風貌」；衛生署的「社區健康營造」；教育部的「學習型社區總體營造計畫」；體委會的「社區體育總體營造實施計畫」；林務局的「社區林業」；客委會的「客家產業」、「客家桐花季」；原民會的「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原住民族部落產業發展」等。如此龐大的資源挹注讓承接計畫的社造團隊在原有的村



里行政架構外，把社區翻轉成為新的政治版圖，擁有中央的財務奧援以及地方的合法化基礎，對原有的農村動力產生很大的影響，甚至是前述的參與剝奪以及排擠效應。

1994年文建會（今文化部）的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推動，在各地引導出公民參與的活力後，2001至2007年配合行政院推動「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推出「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2008至2013年推動「新故鄉社區營造第二期計畫」，整合各部會相關社造方案。2014至2016年文化部推動「村落文化發展計畫」，將社區的概念改為村落，以全國7,835村（里）為文化發展的單位，從「本土化」改為「泥土化」，培植地方的軟實力（張育銓，2012、張育銓，2015）。無論政策詞彙的轉變都是社區總體營造的擴充版與豪華版，在社造人才的培育與擴充、鄉村組織的轉型、社造團體能力的強化、傳統空間改造、社區產業輔導、提升居民對地方事務的參與、建構台灣在地文化特色等，都與1994年所提出來的概念相同。然而，長期下來，除了地方民眾的參與普遍不足，社區營造經費補助的長期誘導，引發社區內部的資源爭奪與惡性競爭，導致社區營造逐漸淪為高度依賴中央經費補助的運作態勢，甚至使社區營造業務成為鄉鎮公所、村里辦公處、社區發展協會及社造團隊之間權力與資源的競技場域（王振寰、章英華，2005：16-17；林將財等，2005：54）。以經費為引導的政策，充滿由上而下的指導，是否與當地不同團體進行整合，才是公民意識提升的重點，而不是用經費分裂各自對社區有願景的不同的團體。

## 肆、從台東芎葉的產業鏈釐清職業團體的特性

芎葉是胡椒科的藤類植物，葉可供嚼食，有辛辣味，在中藥方劑上用於健胃、祛痰、鎮痛。芎葉種植採半日照方式，透過遮黑網防止過烈的陽光造成葉子快速老化。台東芎葉較多精油，香氣芬芳，葉片纖維厚有嚼勁彈性，放久較不變色，耐貯存。芎葉於1976年從彰化縣永靖鄉大量引進台東縣種植，歷經田間管理與運輸系統的改善，根據農委會農糧署（2016）的2015年農情調查，芎葉全台灣種植面積1,747.32公頃，台東縣有1,433.59公頃，佔全台種植面積的82%，其次為彰化縣135.86公頃，佔8%。收穫量方面，全台共9,927,945公斤，台東縣有8,110,696公斤，佔全台產量82%，其次為彰化縣1,062,982公斤，佔11%（如表1）。

表 1：2015 年芎葉種植面積與生產量比較（農委會農糧署〔2016〕）

單位：公頃/公噸

產地/面積與產量	耕作面積(公頃)	收穫量(公噸)
全台灣	1,747.32	9,927,945
台東縣	1,433.59(82%)	8,110,696(82%)
彰化縣	135.86(8%)	1,062,982(11%)

台東區農業改良場估計台東地區芎葉的年產值約為40億至80億之間。在產品運銷體系上，因為政府對檳榔相關產業採取三不政策，芎葉銷售管道不經過現有批發市場，政府不易精確掌握其產銷

量（陳麗敏，2011：1）。目前掌握各地產值大多透過運輸業者的運輸量回報來評估，有業者估計台東荖葉產業每年超過100億。由於荖葉產業鏈許多項目屬於地下經濟，要正確估算並不容易。但是不管以80億或100億來估算，荖葉都是台東產值最高的農業項目。然而，要支撐這麼大的產值，並且可以在交通費用相對較高的條件下，仍佔有全台灣80%以上的市場，必須要有一個完整的產業鏈來維繫。

荖葉產業鏈牽涉的產業相當多樣，從荖葉田使用的資材可以看出大致輪廓，包括：黑網、鐵支架、水泥柱、鐵絲、束帶、噴水軟管、灑水系統、大型塑膠袋、飼料袋、黑色塑膠簍、塑膠繩、竹籤、農藥、肥料、噴藥機、硬質水管、灑水軟管、溫度計、無手把小拖車、斗笠、防曬面紗、袖套、乾稻草等，這些物資需求讓台東市區產生不少五金行、塑膠行、資材行、農藥行、農機行、百貨行、服飾店，再加上運輸業、外送便當與飲料的餐飲店，提供黑網入口鋁門或木門的回收業。這些行業之間相互支援的系統相當多元，在2016年尼伯特颱風創下百年首見17級強風的災害中，透過許多相互協助或者轉作其他作物的歷程，可以看到這個系統運作的即時性與效率。

荖葉的田間管理屬於勞力密集型，涉及大量多元的人力投注，除了產農的家庭成員外，還包括兩種僱工：第一種是專業僱工，包括落藤工與採收工。落藤工只在每年落藤期，以工班方式排定工作表到不同的荖葉園上工，採收工則是跟隨產農的固定工作班底，大多招募荖葉園附近的婦女組成。第二種為兼業僱工，主要在自己住

家處理行口送來剛採收的茛葉，進行清洗、疊葉、排葉、分級、分裝等工作，人力以需要在家中照顧孩子的婦女及老年人居多。因為兼業僱工的技術門檻不高、勞動時間有限、勞動空間為家戶的陰涼處，可以同時兼顧到家庭生活並賺取額外津貼。因此，茛葉對在地就業機會、家庭收入、幼兒與老人照料產生的影響，提供更多非正職工作機會的關鍵。

茛葉產業在台東的地理分布以台東市的豐里橋至豐源橋向東至沿海一帶以及豐源橋與新知本大橋向東至沿海一帶（包括豐里里、豐原里、知本里、建農里等）；太麻里鄉的台9線與知本溪所圍成的三角地帶（包括荒野村、美和村等）；卑南鄉的台9線與台9乙線區域內以及台11丙與卑南溪交會堤防（包括田寮村、豐田村、利吉村等）。這些地點幾乎涵蓋了台東卑南溪、太平溪、利嘉溪、知本溪沖積扇一半以上的農地，很難使用村里或社區的概念來區分茛葉出產地，因此，在一個層面上，透過茛葉產業定位農村動力的話，可以避開與跨越村里的行政單位、接受補助的社區單位、內聚性的部落單位。

這些地點的茛葉種植集中，具有群聚經濟與規模經濟之外，技術支援與工班之間相互調度所構成的協力關係，可以深入到日常生活領域，達成職業身份的相互支援之外的彼此連結。不再是談論生命共同體或是社區共同體的抽象目標，也不再是認同再建構的文創包裝，而是延續著生活步調，在經濟的連結下，彼此產生的動態性連結。

然而，茛葉產業鏈相當龐大，如何成為一個可以影響農村的職

業組織呢？荖葉產業鏈涉及的產業相當廣，甚至包括水泥業與塑膠業。在地理區位上也相當大，透過運輸可以包括全台灣，如果加上進口荖葉則又增加南亞與東南亞的十個國家（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中國）。因此，在界定職業團體時，必須有一定的界線，動態且具彈性與模糊的界線存在，才能讓這個職業團體的作為顯現於人群的日常生活領域中。

## 伍、農村動力的思索

有許多社區以及明星級社造團隊有效地動員民眾參與社區活動與公共事務，提升對社區的認同，但是，這些社區與明星級社造團隊經常只是少數，是各縣市政府積極培植下達成的案例。這些少數案例，經常被進一步培植為縣市的社區營造中心，樂觀地把寫計畫書、辦活動以及核銷經驗進行轉移與複製，產生社造的職業團體。

目前台灣的農村中，非農業人口多於農業人口，那麼，農村動力是什麼？

簡單說就是，凝聚一群為農村生活型式的延續而努力的人所產生的力量。感覺上目標和社造很相近，但是團體組成、地域範圍、經費來源、活動型式、與公部門關係、計劃與提案、日常生活連結、生活中最關心的議題、參與心態與動機、可以提供工作機會洄流、每個人都是實踐者等概念，與社造有著相當明顯的差異，這些

差異正是社造20多年來一直存在的問題嗎？我們要讓問題持續下去，培養更多從事社造行業的人，或者應該改變對農村動力的看法？

農村動力為何重要？農村的未來該交給誰？是農業政策、是社造政策、是其他團體，還是具有連結能力的職業團體？職業團體不是職業工會，而是在構成生活重心的產業長期連結中，所產生的人群合作模式，並且相信一定的規範與專業倫理。本文引用Durkheim職業團體的概念，必須面對Durkheim（1950）提到的職業團體在當代的台灣是否適用，至少在台東的農村是否適用？

首先，涂爾幹認為職業團體讓社會秩序成為可能，是基於思索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連結，思索由職業團體彌補家庭功能的逐漸流失，思索在個人主義過於興盛下由職業團體扮演公利與私利的調節器，思索與人們生活最緊密連結的關注點。如果從這四點來看，在社會秩序以及社會事實的概念上，職業團體確實仍是面對台灣社會現況，尤其是經過農業政策與社造政策的長期影響後，從更為貼近日常生活的群體中產生改變的可能。

再者，涂爾幹認為職業團體具有專業與共享價值觀的倫理原則，可以成為社會秩序的基本單位，從人們關切的經濟面向中產生相互約束的力量。如果從經濟面向著手確實是台灣農村關切的主題，至於專業倫理出問題通常在農產品加工端，在生產端主要是農藥使用問題，但這個問題的關鍵是經濟而不是倫理，因為長期抑制糧價與犧牲農業在產銷不均衡下產生搶進式經濟（張育銓，2012），因為快速、大量、美觀等因素，希望獲得更好的經濟、更

能取得的收入。

最後，涂爾幹認為職業團體是在社會分工的概念上，可以構成社會整體，產生社會秩序的整體面。然而，這樣的想法是否符合當代分工狀態。劃分越細也越模糊的狀況，尤其兼業農比例，導致分工並非構成社會秩序的原則，而是經濟動能產生的再分工結構，這樣的再分工結構產生個人交錯在不同職業身份和參與不同職業團體的狀況，從而出現個人與社會的新關係型態，這種新關係型態值得進一步觀察與研究。

本文討論農村動力的幾種形式，尤其農業政策與社造政策長期消耗農村動力的狀況，透過台東荖葉產業鏈為基礎，討論職業團體在農村可能扮演的角色，期盼在社區營造的架構外，提供農村動力的新觀點，也提供農業從業者重新獲得以日常生活的觀點規劃家鄉的機會。

## 參考書目



- 王振寰、章英華，《凝聚台灣生命力》（台北：巨流出版社，2005）。
- 中華經濟研究院，〈GDP 各產業產值及成長率〉（來源：  
<http://www.cier.edu.tw/cef/p2.pdf>, 2015.12.2）。
- 台東縣政府，〈103 年統計年報-T4 農、林、漁、牧提要分析〉（來源：  
<http://www.taitung.gov.tw/statistics/News7.aspx?n=D6923023CD508744&sms=25C5947ECD01B1AF&CategoryParentSN=33584>，  
2015.8.1）。
- 行政院主計處，〈2010 年農林漁牧業普查初步統計結果提要分析〉  
（來源：<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24201425771.pdf>，  
2011.9.5）。
- 行政院主計處，〈縣市重要統計指標〉（來源：<http://statdb.dgbas.gov.tw/pxweb/dialog/statfile9.asp>，2016.12.21）。
- 行政院農委會，〈103 年農業統計年報〉（來源：<http://agrstat.coa.gov.tw/sdweb/public/common/CommonStatistics.aspx>，2015.4.21）。
- 行政院農委會農糧署，〈農情報告資訊網〉（來源：[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http://agr.afa.gov.tw/afa/afa_frame.jsp)，2016.8.1）。
- 林將財等，《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工作之成效與檢討專案調查研究》  
（台北：監察院，2005）。



陳麗敏，《供應鏈管理應用於台東地區荖葉產業關鍵成功因素之研究》（屏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所碩士論文，2011）。

張育銓，《社區總體營造脈絡下的觀光發展：花蓮豐田社區的觀光人類學分析》（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2）。

張育銓，〈花蓮明星級社區發展觀光的限制與可能性〉，《育達科技大學學報》第 39 期（苗栗：育達科技大學，2014）。

張育銓，〈為何社造團隊與社造協會沒有轉型為社會企業〉，國立臺灣大學「人文思維與社會實踐的新介面：社會企業與東台灣發展研討會」論文，2015.10。

張育銓，〈從觀光資源的角度討論資源以台東荖葉為例〉，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與族群研究」論文，2016.9。

曾旭正，《台灣的社區營造》（台北：遠足文化，2007）。

Durkheim, Emile，渠敬東譯，《社會分工論》（台北：左岸文化，2002（1893））。

Durkheim, Emile，渠敬東譯，《職業倫理與公民道德》（北京：商務，2015（1950））。

